

如何查禁一个影展

艺术运动存在吗？

2012年8月底的某天，张海涛给左靖打电话，通报我们正准备在798园区视空间举办的“艺术运动存在吗？”项目出现了问题。

这个项目是我与左靖合作的“艺术中心放映联盟”第二年度的计划。主要选片人是左靖，他希望通过这23个独立影像作品从侧面勾勒出过去30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历程。此联盟是我们数位经过4年左右的努力，于2011年创办的，第一年度的放映主题为“当代中国人的一生”，曾于当年度在中国六个不同城市的7个艺术空间展映，比较顺利。

张海涛主要工作领域为实验录像的策展，曾长时间为栗宪庭先生打理宋庄美术馆的事物，并担任一个艺术文献库的协调组织者。

出现的问题并非纯属意外。它的新鲜之处是体现出了行政力量的提前量、良好的协调、坚定的意志。

之前在同一个园区，我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合作的“独立电影会”已经在年中遭遇了麻烦。舒浩仑的故事片《黑白照片》放映被提前终止，时针影像工作室组织的魏晓波纪录片《生活而已》放映也被提前终止。只是当时仿佛还在我称为“精确打击”的工作方式中，只针对具体时段的具体作品。但8月底的情况，似乎回到我称为“集体惩罚”的工作方式中，就是盲目的、针对群体而不是针对个人的、无法了解惩罚结束时间、也不允许替代方案出现的操作和执行办法。

张海涛又接着收到了别的电话。该空间接待了个别意图很暧昧的造访。张海涛与该空间的老板顾振清协商后，通知了左靖和我，决定中止此活动。当时离预定的开幕日还有不到一个星期，该空间已经准备好了投影、座椅、幕布、现场交流的音响等。其中至少座椅和幕布的钱白花了。

到了预定的开幕日，作为一个闲人，我还是去了现场，因为当天另外几位先生都在忙别的事情。视空间的接待小姐用黑马克笔、复印纸写了一个活动取消的通知，贴在大门上。其实，没有人有权告诉失望的来访者，到底是怎么回事。连取消的通告，也按照上级的指示，不允许写查禁或取消，只能写是因为艺术空间自己的原因，无限期推迟。

如果不推迟，上级说后果自负。可能的后果是什么？

午后，到了原定的开幕时间，一位蹩脚黑夹克大叔自称是没有看到取消通知的观众，他非常想知道我们准备了什么替代方案，他认定如果空间是空荡荡的，来宾们一定秘密地聚会在另一个地方了，他要求作为“普通观众”，也应该得到“内部消息”。但是我们没有内部消息，只有公开的部分，公开的部分就是他目睹的部分。他似乎被我和接待小姐说服了，离开了。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又来了四五个人，有男有女，拿出了证件，巡视一番、确认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之后，警告接待小姐“不要把自己搞进去”。他们也走了。

至此我决定去旁边喝了咖啡，在线通报了我的所在，请失望的观众过去，由我请喝咖啡。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十来个人来了空间，仍然是便衣，巡视一番之外，离去。此时，接待小姐也决定锁门离开了。

我回到该空间门口时，接近傍晚。我认为所有的无聊都已经结束了，不会再有任何奇观，纯粹是凭吊一下。但是，突然停电了。

此时停电完全是一个盲目的举动，来的前后三批人已经明确看到活动取消了，此时空间锁着门，里面一个人都没有，还停电干什么？这只能说明查禁者在经验累积的过程中，在 2012 年中的某个时刻，将停电这个举动升格为了标准程序的一部分，当行政机器启动之后，现场的具体情况无法影响执行的标准程序。

此停电的盲目，也在于不管是谁拉闸，他没能找到只停视空间一家电的开关，此开关很可能在空间里面，而此行动并不打算让空间的工作人员了解并执行。所以拉闸者断掉了那条小街的电。旁边受到牵涉的店铺共有七家，比如一家卖明信片等小纪念品，两个画廊（展出并出售的绘画实在不怎么样）。都是没有电无法做买卖的地方，顾客啥也看不见啊。这些无辜的营业者走出店门，站在街头盲目地给同事或朋友打电话或发微博，等待下班的钟点。我没有勇气告诉他们：我就是罪魁祸首。

停电大约两个小时之后，电又来了。大家一阵欢呼，画廊营业者总算可以把电子门关闭下班回家。

尤伦斯艺术中心负责公共活动和教育项目的谢萌当时去了欧洲，回来之后，向我分析，此周折可能与我们合作“独立电影会”的阻碍类似。2012 年春天的某个时候，北京市文化执法大队来了一个人，坐镇在管委会，检查园区的各个项目和作品。他依据的标准是北京精神，就是“爱国、厚德、包容、创新”那几条吧。他认为他下来做这个具体工作只是 2012 年的特殊情况。

到 2013 年初，此人还坐镇在那里。而且具体说来，我个人也不大相信万一没有派他下来、或者派的是另一个人，过程或结果会有很多差异。

碧山丰年祭和黟县摄影节

2011 年 11 月起，我开始尝试将弗拉哈迪纪录片研讨会介绍到中国来，合作者是 Mary Kerr 和 Genevieve Carmel，前者当时是弗拉哈迪研究会主任，后者当时是北漂，自由工作协助一些策展活动。该研讨会已经举办了 58 届，他们希望在 2012 年期间在中国举办一届，由我与纽约 moma 纪录片放映的排片人 Sally Berger 共同负责节目和内容。我们希望中方和美方的来宾各自 50 人左右，间杂部分其它来源（如亚洲其它地区）嘉宾 10 人左右，放映节目方面，5 - 10 个经典影片，多数为当代纪录片作品，20 个以内。主体是为期 7 天的讨论，分三个会场进行。

我天真地认为这样一个正式的、有悠久历史、规格较高的国际研讨活动，将有不少中国大学张开双臂欢迎。确实如此，一开始很顺利，我任教的北京电影学院某领导很有信心地提出希望出

资 60 万元负责此会议的中方全部工作。但随后一次院务工作会否定了此项目，我级别不够，一直没能知道原因。据说个别领导还不死心，在几个月后的另一次院务工作会中再次提到此项目，再次被彻底否决。

之后，此项目开始了全国马拉松，前后四个月，我背着它，在几个城市向可能的合作者介绍，但都被拒绝了，拒绝的机构包括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出版机构。经济 / 融资的问题只是第二位的，但我没办法知道是与那么多美国人开会比较危险、还是纪录片比较危险，是我本人比较危险、还是规划中的节目比较危险（当时我们还没确定具体放映哪些作品）。

期间 Mary 希望我去纽约进一步磋商，时间紧迫，我没去成；我请她来西安影展做评委（感谢董钧等人的策展和安排），她来了，提出希望在年底前在中国举办有限规模的活动，请两三位美国纪录片导演来，放映 4 - 6 个纪录片，并在现场交流，不大规模放映，也不做研讨。

我立即联络了左靖，询问他与欧宁合作的碧山丰年祭 / 黟县摄影节是否有意。这个商讨在 Mary 离开后持续了一段，为了符合丰年祭 / 摄影节的主题、也为了安全性，大家确定以农业为纪录片的共同探讨对象。Mary 组织了几个农业话题的影片，由 Genevieve 组织了翻译和技术加工，欧宁要求提前观看，他也及时受到并观看了。一切都像在正常进行。

丰年祭 / 摄影节本该在 11 月举行，因为它必须在秋收之后举办，但又不能太晚。摄影节是地方政府创办的，并由政府出资。他们只是希望欧宁 / 左靖的组合接手之后，此活动更有特色、声势、影响。

在整个 10 月份，Ciff（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在南京的筹备工作一直有一些行政阻力。几个核心组织者、包括我，一直在考虑协商是否应该把部分展映和活动分散出去，首要考虑之一是将纪录片的部分挪移到碧山，在欧宁 / 左靖活动的名义下，共同举办。这是因为他们 2011 年度曾经有不少电影放映和纪录片展映，2012 年度，左靖也已经准备了一些中国的农业 / 农村纪录片，将与 Mary 的一同交叉展映，我们其实只要扩大丰年祭的展映部分，而且具体工作可以由我们南京和北京的团队来完成，最少程度占用丰年祭的费用和人力。南京与碧山之间只有大约 3 小时车程，从 90 年代初开始，南京就有艺术家去碧山附近常驻。

Ciff 的这个提议非常糟糕。丰年祭此时岌岌可危、自顾不暇。当地几个行政部门之间意见分歧日益尖锐，比如旅游部门作为摄影节的创办者，坚持做下去，但宣传部门反对。反对的部门担心的是什么？可能是部分摄影作品会不经过他们审查就展出？可能是外宾太多难以控制？但国内大部分摄影活动，总是大部分展出作品没有经过预先审查，这与出版系统一样，是策展人和主办方负责的方式，如果出问题，事后追究，这是与电影审查很不一样的；其次，作为一个旅游地区，要做的就是多吸引来宾，更不存在行政机构不习惯面对外宾的情况。

任何艺术活动与在地者相结合都会有磨合问题。2012 年这个年份有那么特殊吗？11 月是个如此特殊的时间？但是没有人能改变秋收的时间，那么怎么改变庆祝秋收的时间？

南京的当局，当时已决意制止 Ciff。影展的一部分可能挪移到另一个地方，将可能使他们的监管工作前功尽弃，而且这证实了他们在标准程序中的一再担心：永远存在另一个聚会地点、这些狡猾的策展人们看多了麻雀战地道战四渡赤水铁道游击队。南京的有关部门及时通知了碧山

的上级。碧山的各个部门在各个矛盾聚焦点，开了三天会，最后在离活动开幕不到 48 小时的时刻，决定取消一切，并要求欧宁在公开通告中只能说明是由于展览方布置不及时，展览被无限期推迟。这个说法也是 2012 年新标准程序的一部分。各地保持高度一致，说明在中央级别有部门或工作小组在密切协调这些行动，制定标准程序，统一口径。

我最后一次与 Mary 联络，她在纽约暴风雪中起飞。她到美国西海岸接上两位导演，飞越太平洋，到了上海机场，准备转机去黄山市，才收到取消的消息。在去碧山游览之后，她们在沪、浙的两所大学举行了放映交流。

几点分析

Ciff 的问题可能最复杂。汇集各种信息，大概能猜到，在 2012 年的春季或夏季，某个中央管理部门提高了对整个独立影像的警戒度。这不仅是由于这是一个特殊年份，也因为各个级别和各个部门长期以来对独立影像、尤其是纪录片的关注、跟进、调研，由于独立影像的创作实践和公开活动已经大致是一个固定的模样，从而这些部门既了解到了作品内容、活动方式，也了解到了核心人头、参与的组织方、可能波及的方面。这个特殊的年份只是使得做了精心准备的这些部门有理由将长时间的互动和调研结论付诸行动。这是一个树立假想的年份，假象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向必须对等地展开，积极的方向就是大报告中规定的未来几年的任务，消极的方向就是为完成这些大目标必须拆迁的那些社会局部。

独立影像近几年警戒度提高，能分析出来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条：

1、网络视频潮流，使得社会记录或介入社会的记录视频迅猛增加，反过来影响到了曾经影响过它们的独立影像领域。比如我断续收到一些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给的碟片或链接，前几年他们还像是比较向往作者的身份，比如会寻求在之前或之后跟我认识，了解我，共同探讨。只有一些学生，只寻求作品被别人看到，有关作品可能形成的讨论或展映中的碰撞不太重要。但后来我陆续收到的一些维权纪录片，甚至不一定有片尾字幕，创作 / 制作者也不露面，只寻求让我看到，并寻求可能通过我让更多人看到。2010 年以前我组织的影弟放映是个小规模内部讨论活动，曾经少量放映讨论过这类作品，但 2010 年之后，我放弃了这种小众的方式，面对更多观众的线下活动，需要的节目整体上在社会性上确实需要软化，但并不意味着此软化一定能够保障活动的顺利开展，比如农业话题就是一个例子，我想不出有什么比讲述美国牧民 / 牛仔迁徙或棉花种植的纪录片在内容上更“软化”的例子，我总不能播映书店里卖的碟片或航空公司给国际旅客预备的记录节目吧？那文化的价值就让它彻底消散？这当中比如我收到过王丽蕪女士的几个作品，但至今我还没有与她碰面过，也不可能在我策展的各个活动中播映这些作品。

2、艾未未先生是上述纪录片新潮流的标志人物，这个潮流大概是 08 年之后逐渐增强的，之前只有胡杰等个别人。我认为，对艾先生来说，纪录片是开启社会潜能的武器。我与栗宪庭先生并不同意这个看法，在 2011 年 5 月，宋庄影展遭受挫折之时，五六好友在栗老师家聊天，期间栗老师与我取得的一致意见，是，中国的独立影像首先是一个艺术运动，其次，在事实上，它也是个社会运动。艾先生呈现了他认识到的视频的直接性，在超量膨胀的同时也形成巨大吸附，成为精确打击的巨大目标。

3、阳光卫视在陈平、程益中、张钊维等主持、策划下，采取了相对比较激进的策略，在独立纪录片中选取介入社会程度较深的作品，与部分网络视频纪录片一起，组成一个线上竞赛活动，向网友播放，并号召投票。同时也有一个评委评选机制，我在收到他们的邀请之后，成为了他们的评委候选人（他们创制的制度是评委候选人经网友投票后，票数较高者成为正式评委），之后收到广电部门的喝阻电话，要求我不要加入阳光卫视的评选。由此我得知广电与别的部门共同决定，并不直接彻底地封杀阳光卫视，只严格限定它的影响和传播。阳光卫视纪录片大奖不仅让部分网友集中地发现了部分独立纪录片，也让中国几个有关部门集中发现了干预社会的独立纪录片。我个人认为，在阳光卫视纪录片大奖第一年、即 2011 年之后，2012 年期间，广电等部门一方面制定了限定其影响的一系列措施，另一方面对另外一些在中国境内举办的纪录片或记录短片竞赛活动放宽了一点，让这样的活动能够更顺利地创办，它们必然更“软性”一些的节目在整体上能够平衡广电等部门锁定的阳光卫视作为电视媒体的“巨大”影响。我个人在 2012 年夏天辞去了当时的阳光卫视纪录片大奖评委候选人，但这并没有给我做的其它活动、可能内容更“软性”的活动，带来任何安全系数。

4、独立影像领域多年在实践中形成的灵活多变策略，在运用中，走到了某个瓶颈。一些重要活动在草创期，临时、粗糙、不完整、即兴的方式，被认为是起步阶段的必然。但在实践中，随着外部压力的起伏、策展人们的具体困难，这种“游击战”式的操作方式，一再复活。陆续创办的一些新兴活动，更继承了这个特点。这些特点与中国独立影像的本身素质并不相悖。也是这些特点使得部分活动一直有相对敞开的空间。但不同行政部门在历年的调研、摸底、跟进、喝茶交谈、电话恐吓等实践中，也了解了底细，知道这些“游击战”方式的大概策略、层次、底线。这类似藏猫猫的游戏。终于，2012 年，有的部门丧失了继续躲猫猫的耐心，选择对举办时间比较长、观众人数比较多的活动下手，所谓打了场歼灭战。这其实也说明，独立影像作为非正式的经济体，如果要存活，或者必须更加非正式，即把自己弄成极其暂时性、一次性的行为，符合当今的快餐状态，或者变为隔绝于社会宏大话语的更加个人化讲述，就是毛晨雨讨论的那些内容如在地地的具体经验。这两个倾向并非我个人意愿所向，但恐怕以后作品和活动方面都会如此。当然，同时会有一批庞大的软化倾向在作品和活动中取得全面胜利，此话题中毛晨雨讲的“恶心”的龙标独立电影，大部分人可能并不认为恶心。

2012 年 10 月期间，不同行政部门向 Ciff 组委会有关人员、主要是曹恺，提出了一些要求，举例如下：

1、不要有国际来宾。

我们认可了不向任何国际来宾发送请柬，乃至不向有兴趣了解的人士发送通告，但我们无法国际人士入场，此影展自 2003 年创办以来，放映和论坛均向大家开放。比如上文提到的 Mary Kerr 和 Sally Berger 就曾都自费、自办签证来看片。再比如 2011 年上海的美领馆派了两位女士，既没有通知我们，也没有与南京的任何部门打招呼，直接来到我们纪录片论坛现场，恰巧那场论坛还很热烈，她们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但在南京的有关部门看来，挑衅性明显，他们认为肯定是影展组委会把她们叫过来的，所谓狭洋自重。美领馆的这种“未经审慎考虑、不计后果的鲁莽行为”（这是当时在北京的一位法国外交官对他们的点评）给 Ciff 组织方带来不少压力。再比如 Ciff 的第一位外籍评委、纽约大学的司徒安女士，也引起过不同部门的担忧。

2、不要公开宣告影展的消息。

宋庄的活动一直有这样的压力。我们停止了对网站的更新，我们还会对国内来宾和其他感兴趣的人保持电邮通知。作为一个并非完全刻意的举动，影展的工作邮箱为中国雅虎和 126，这样监管人员或许可以明白我们的言论是相对公开、没有秘密的。

3、不要做任何公开放映，也不要举办论坛。

我们不大明白，如果这样，这如何还能称为一个影展。但这并不是一个根本不能谈的问题。南京的组织者们（当时我在北京）与这些部门的对话者就公开或公共等概念和尺度进行了有限但仔细的探讨，比如我们并不做露天放映，也不会街头活动。涉及到的可能性，与以前一样，包括影院、大学校园、艺术空间等，只是影院的比重将增加。

4、提供影展筹备的材料，比如所有报名影片的备份。这个要求，Ciff 的组织方拒绝了。

大声展

十月一整个月，我在北京筹备另一个活动，这一届大声展的影像单元。大声展是多个艺术门类的综合展示活动，由欧宁创办，以设计为主要特色，一直有影像单元。2012 年，现代传播集团继续主办，《新视线》杂志主编、非常 glamour 的一对情侣，彭杨军与陈皎皎，从欧宁那里接手总策展，夏天时他们找到我，希望我组织里面的影像单元。

此次主题是“未来”，也是组织方与联合国某机构合作的一部分。我希望以两个部分构成影像单元，废墟与塑形。废墟部分展现拆，和拆的结果；塑形部分尝试展现轮廓尚模糊的、正在成形中的形状。每个部分包括一个长片和数个短片，每组短片构成一个正常放映场地的时间长度，这样总共有四场放映，契合展览电影循环播放一个工作日的时间量。出于推广的目的，总策展人也组织此套节目的一部分在一个艺术影院放映、现场交流。我就此筹划组织了四场公开对话 / 映后交流，大约将有 10 位长短片导演来到现场，还包括一些其他嘉宾，如国际电影节选片人、中国媒体工作者、摇滚歌手，以及欧宁本人。

18 大前夕，大声展顺利开幕了，地点在北京商业的核心地带，三里屯。展览很炫，我们的节目也很炫。连续两天，我每天到场两次，看一下，再请跟我打过招呼的、特意来观看的朋友去附近吃午饭或喝咖啡。之后，一个志愿者负责放映，他每天结束时向我报一声平安。观众并不多。这个平静的状况持续了五天。

周六上午一大早，来了位大叔，出示名片，北京市广电局市场处处长王健。他说收到举报，说这里放映的影像有“反政府”的内容，特来查禁。他针对的那个部分，似乎是“废墟”。传媒集团的公关部门紧急出动协调。王处长叫来了市文化局、管片派出所、市局的人们。文化局到场的人员表示此展览从来没有经过他们的批准。执法部门立刻要求全部关闭，清场、封门、室外广告和标示清除。这些过程在当天下午完成。

我得知出事的消息时，离准备的第一场公开交流还有4个小时。导演们在机场或地铁，收到第一轮通知后纷纷询问。我们在现场的是一个台湾女孩游小姐，她与公关部门的人员其实较成功地阻止了第一轮打击走向完全失控的规模。广电的官员声称“知道张献民。回头会找他。先把这里的事情搞清楚”。游小姐希望我不要在现场。

我去了旁边的一个咖啡馆，上线通报了我的所在，告知特意赶来、进场无望、希望有人说话的朋友或陌生人，可以去找我，我请咖啡。通知了嘉宾们取消一切交流对话。

从下午直到深夜，共有20-30个人来打个招呼，或坐下聊聊。一半是以前不认识的人，走的时候留个网名或一个链接地址纸条。他们大部分自己付帐买了咖啡或蛋糕。两个从上海坐飞机、利用周末专门来看大声展的小资美女冲我发飙了，责问为什么不提前通知取消，“你们办了这么多活动早就应该很有经验的啦，怎么说关就关了”。个别朋友和我表达了我们诚挚的歉意。当时到场与我们共度那个绵长周六傍晚的导演有吴超和陈心中，他们在大声展展映的作品是《追逐》和《旧城》。前者在塑形部分，是个20分钟的动画作品，深受欧洲影响，尤其是达达派，有关人的脆弱、机械化复制；后者在废墟部分，是个8分钟的纪实/实验短片，低科技幻象，爆破后的废墟上不时有人来回找钢筋等可以拆下来去卖钱的东西，陈心中把同一机位的不同时段重叠起来，那些在不同时间来废墟上游荡的人们，就像互相掩映的鬼影。

经过三天的公关努力，大声展重新开幕了，市文化局干部认定所有艺术作品没有问题，紧急颁发了批准。但所有影像部分停止，除了影像单元外，当代艺术单元中的视频放映部分也取消了。公关部门还为音乐又谈判了一个星期。音乐单元由健崔策划，这艺术的本性是要聚众的。最终以类似工作坊的办法举办了，有一定数量的公众参与。

广电的干部没有再找过我。我单位的领导给我打了电话，做了些嘱咐和告诫。

Ciff 以及结论

在等待大声展公关进展的过程中，Ciff在南京的负责人们通知我，取消了。不同行政部门在一些游移之后，终于决定关闭一切。他们一轮轮地联络、约见所有相关场地的负责人，影院经理、影院的上级、大学院系领导、大学的上级、艺术中心的策展人或老板。个别大学院系还表达过对查封的不满，行政部门因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派人去检查，不希望出遗漏。影院如果不听话，可能关张，也可能收到巨额罚款。两家私企艺术机构都收到了数百万的罚单。一周之内，Ciff丧失了所有合作伙伴、所有场地。在预定开幕前大约三天，我们开始通过电邮通知来宾和导演们取消他们的行程，同时通过微博、尽量和缓地公开告知影展讲延期至某个未知的未来。

我来到南京参加善后的工作，旁观影展这朵破碎之花，或者说被强拆之后的废墟。也要回答部分人的提问。我在影展的合作咖啡馆向失望的来宾/观众提供咖啡，前后连续三天。这三天中，每天只有不足十人来找我，多数是旧友，少量是新朋。多数人如此失望，以至他们即使到了南京也不想露面，或见面了却不说话，呆呆望望，就走了。

在新认识的人当中，最有意思的是一个 21 岁的小伙子，一个很户外、很阳光、有礼貌、很健谈的年轻人。他高二时就被请喝过茶，因为他在学校组织了一个有关公民社会的读书会。高中毕业后跟随民间人士去打拐。现在刚入高校，专业是特殊教育，以后要做功能或肢体障碍者的老师。

他是一个行动主义者。我不是。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甚至也不是艺术家，即使我根深蒂固地认为创办或组织公开的艺术活动，需要巨大的创造性。如果别人认为我是艺术家，我会反对；如果别人认为我是行动主义者，我不会反对，但我可能只是个事实上的行动主义者，那并非我之所愿。

所以经历 2012 龙年漫长的互动，我最终的考量，还只能有关我自己。我是个什么人？我是否浪费了过多的公共资源？如果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是否造成损失的规模更可控制一点？我是否在长时间的相互作用下，过分趋同于审查者了？我个人真地需要那么多公开活动吗？谁需要公开的艺术活动？我真地需要喝那么多咖啡吗？

这些提问，说明我首先是一个思考者。这个身份在我的其它身份之上。

90 年代，行政力量放弃全民奖惩之后，大量运用了集体惩罚，比如惩罚摇滚乐或行为艺术的整体，相对比的是必需奖励改编后的民歌或所谓民族唱法的整体。电影界曾经一次集体处罚 7 个人，不允许从事此行业。2000 年之后，尤其 2003 年之后，整个策略转为精确打击，不以驱散、惩治、限制人身自由为目的，只以个别人为目标，在精确的时段中，使他丧失行动能力、孤立隔绝他。但行政力量仍保留着回到上一个世代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可能采取行动造成大面积损伤。我个人认定 2012 年是文化艺术领域的强拆元年，部分行政力量证明了将强拆的方式运用在文化艺术领域，是有效的，因而他们将继续如此。不少人要有心理准备，长时间面对艺术的废墟，而不是艺术。

本文基于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即使牵涉到他人的部分，那也只是我的理解和言说，所有话语责任只在我一个人。

这里要插入的理论说法是在当代对艺术的看法中、尤其是美国行动主义背景下，社会与艺术基本是合体的，这与欧洲人抽象地议论“电影就是政治”是两回事。我个人赞同艺术的当代性，尤其认为独立影像是当代性的一个典型（我尝试总结过平行性、时间异化、面对面社群建设、增量传播等一些特性，在此不废话），但我也恰恰认为此合体并非均质，完全同等对待，艺术家身份的吞噬性会膨胀，同时社会行动主义也会膨胀，也是一种诞生于资本语境的泡沫。比如中国的艺术运动，再比如具体到独立影像作为一个运动，与社会运动并不同步。贬义地来讲，这个艺术有点像无法解出的方程式，其无法解出的部分和解的过程均被释放为另一种声音的模样，至少在另一个次元对部分年轻人形成新一度幻觉，幻觉的核心是创造性是有用的，于人或于己。在某些不可控制的偶然性影响下，这个创造居然有可能达成（从而是方程式被解出来的模样），甚至即使不可能达成，解的过程也可能在偶然性的影响下，对社群或对自己“有用”，这个用处首先是心理上的，其次才是社会意义的，而且社会意义很多情况下只是对集体意识的影响而不是对事实的影响，所以此“有用”的意义借由放映和讨论来实现，其意义首先是对观看者的意义。所以，我与艾先生是有分歧的，虽然这个分歧相当微小，却形成巨大差别。